

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

• 第三集 •

主编：郑祥福 卢福营 何增光 周志山

东方出版中心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 / 郑祥福等主编. —上海: 东方出版中心, 2008. 6

ISBN 978-7-80186-863-3

I. 马… II. 郑… III. 马克思主义—发展—中国—文集
IV. D6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88868 号

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

出版发行: 东方出版中心

地 址: 上海市仙霞路 345 号

电 话: 021-62417400

邮政编码: 20033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上海华成印刷装帧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16

字 数: 1100 千

印 张: 64.25

插 页: 1

版 次: 2008 年 6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80186-863-3

定 价: 98.00 元 (共三册)

目 录

第三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与科学发展观

第一编 毛泽东思想研究

日本对毛泽东思想的研究(张文琳).....	729
毛泽东的“中国革命实质论”解析(张文琳 张晓峰).....	737
论红军长征在甘、宁期间对回族施行的政策(张文琳)	742
试论刘少奇统一战线领导权理论(章小朝).....	756
毛泽东农民问题理论和实践探析(章小朝).....	764
新中国建立初期主要矛盾的再思考(何增光).....	774
再论刘少奇的“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思想(何增光).....	781
毛泽东的权力制约思想(何增光).....	788
中共七大与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何增光).....	795
试论解放战争时期任弼时的土地改革思想(张根福 刘平涯).....	805
庐山会议由纠“左”转向反右的深层原因初探(张根福).....	811
论城市基层政权与居民自治的有机衔接(杨 辉 张根福).....	817
论毛泽东的“新人观”(张根福).....	824

第二编 邓小平理论研究

正确认识和处理新时期人民内部矛盾的指南——学习邓小平关于正确

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论述(叶山土).....	831
论邓小平“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两个原则(叶山土)	839
论邓小平按客观规律办事的方法论(叶山土).....	846

论邓小平的条件观(叶山土).....	854
邓小平关于比较的思想方法(叶山土).....	860
邓小平思想政治工作理论的特征探析(叶山土).....	867
邓小平时效意识探析(叶山土).....	874
国外学者对邓小平的风格个性研究(张文琳 马启民).....	881
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新发展——邓小平政治伦理思想的探讨(王 珉) ...	890
邓小平的历史教育思想(何增光).....	897
邓小平的权力制约思想(何增光).....	902
邓小平统一战线理论的时代特色及现实意义(何增光).....	909
注重学习邓小平观察、分析问题的立场和方法(何增光)	916
论邓小平的国家安全观(李长根 陈大理).....	921
邓小平政治哲学思想初探(张啸尘).....	928
邓小平理论与西部大开发(鲍江权).....	937

第三编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科学发展观研究

尊重社会发展规律与发挥主体能动性的统一——学习“三个代表”重要

思想(叶山土).....	942
关于实践“三个代表”的几点思考(叶山土).....	950
论邓小平的信息观(叶山土).....	957
论“与时俱进”的哲学意蕴(叶山土).....	964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必须大力发展人才主体生产力(叶山土).....	968
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国家指导思想的规范性(陈 刚).....	975
论江泽民关于权力制约思想的理论内涵及现实意义(何增光).....	983
论政治文明建设的基本原则(章秀英).....	991
论民本主义与民主政治建设(章秀英).....	998
强化意识形态教育 占领意识形态阵地(鲍江权)	1004

第三集 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科 学发展观

第一编 毛泽东思想研究

日本对毛泽东思想的研究

张文琳

日本介绍毛泽东可追溯到二三十年代。早在1926年至1930年,日本人就写有《国民党与共产党的新关系》、《从国共两党的合作到分裂》、《支那共产党之概况》、《中国共产党文献考》等二十余篇文章,用一定的笔墨评述了毛泽东。此后至抗战期间,据不完全统计,日本研究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的官方机构和民间人士很多,发表研究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的文章、专著百余篇,但其中相当部分是为了收集和研究有关毛泽东的情报而写的。

日本真正意义上对毛泽东思想的研究,是从中国抗日战争取得胜利以后开始的。中国抗日战争取得胜利以后,日本一些有识的中国研究者开始反省过去对中国的错误认识,他们抱着一种“加害者意识”、“赎罪感”^[1]参加日本民间的中国研究所,继续从事中国问题的研究工作。同时,在抗战期间,在延安和中国解放区工作的野坂参三等日共党员和“日本人民解放联盟”盟员,先后回到日本,宣传、介绍毛泽东。由此,日本对毛泽东的研究步入正轨,出版了不少介绍毛泽东和客观评论毛泽东思想的著作和文章。其中有代表性的是日本学者岩村三千夫于1948年写的《毛泽东思想》(世界评论社)一书。该书高度评价了毛泽东思想的国际意义。他写道:“毛泽东相信他的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中国版,岂止如此,我们越放眼于亚洲,就越发感到毛泽东的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亚洲版的代表。这是因为中国和中国革命所处的条件同亚洲各国及其民族解放运动所处的条件基本上是一样的。”此外,中国文学研究家竹内好,也高度评价毛泽东的根据地革命的意识 and 延安整风运动的实践。

新中国成立后,日本对毛泽东思想的研究逐步深入。1952年,日本学者松村一人以《论毛泽东哲学的意义》为题,在《思想》杂志上连续发表文章,详细论述了毛泽东思想,特别是以《矛盾论》、《实践论》为主要内容的毛泽东哲学思想。他

充分肯定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意义,认为《矛盾论》、《实践论》“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向前推进了一步。如果不学习毛泽东的哲学,我们就不能谈论马列主义哲学。如果不学习毛泽东的著作,我们也就不能充分理解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哲学。”他认为毛泽东哲学“不仅仅是马列主义哲学具体地应用于中国革命的特殊实际,并且有中国民族形式,而且具有国际的意义”。松村一人还研究了毛泽东哲学的根本特征。他认为:“哲学同本国革命理论相结合,哲学贯穿于以解放为目标的经常斗争之中,哲学同民族的智慧相结合,这就是毛泽东哲学的第一个根本特征。”毛泽东哲学的第二个根本特征是“它彻底地打破了对辩证法的教条主义理解”。此外,他对《矛盾论》的基本理论作了较深刻的阐述。1953年,松村一人的《辩证法的发展》一书正式出版。在该书中,他进一步系统地论述了毛泽东哲学思想。

1958年,日本学者新岛淳良在《思想》杂志上发表文章,对毛泽东认识论中关于认识的出发点进行了分析。他认为,毛泽东是实践辩证法的发现者,对他的实践辩证法来说,认识的出发点是人们的社会实践,而不是客体,更准确些说,不是物。这意味着毛泽东实践型的认识辩证法同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的“反映论”是不同的,即毛泽东的认识辩证法不是把人的思想、意识看作镜子照映事物那样的存在的反映,而是把这些看作是实践中的一个过程,因而否定了只有一个固定的逻辑空间的思想。

这一时期,为深入研究毛泽东及其思想,在日本首次出版了日文版的《毛泽东选集》(4卷本)。

20世纪60年代初,由于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国际形势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日本对毛泽东思想的研究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其主要表现是:日本开始全面开展有关毛泽东及其思想的文献史料的搜集整理工作。从此时起至70年代末: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编辑出版了《中国共产党史资料集》(共12卷,劲草书房,1970年—1975年),日本立命馆大学教授、著名的毛泽东文献学研究专家竹内实主编、日本毛泽东文献资料研究会编辑出版了《毛泽东集》(共10卷,北望社,1970年—1972年)。后来,又出版了《毛泽东集补卷》(共10卷)。这样,《毛泽东集》和《毛泽东集补卷》一共收集毛泽东1917年至1949年的著作近千篇。其中有一些非常珍贵的历史文献。《毛泽东集》和后来的《毛泽东集补卷》是目前国外对建国前毛泽东著作文献编辑最系统、最全面并具有权威性的版本,已成为国际学术界公认的研究毛泽东思想的标准本和参考工具书。英国著名的毛泽东研究专家施拉姆,对这部《毛泽东集》大加赞赏。他说,70年代初,在毛泽东的思

想研究方面,由于竹内实主编的《毛泽东集》的编辑出版,日本人的作用大大地增加了。如果不是这套既包含公开版本又收入内部版本的资料自1978年以后广泛出版,与今天的情况相比,我们关于毛泽东的思想的知识肯定会支离破碎得多。

除以上所提的主要资料以外,日本还出版了下列资料:日共中央组织日本中共问题专家在中国方面的协助下,对1953年出版的《毛泽东选集》进行了修订(1962年);东京新日本出版社出版了《毛泽东选集》(4卷本)(1962年);《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也在日本出版(1977年)。

在此期间,中国“文革”发生后,在日本还曾掀起收集翻译毛泽东的讲话、文章、指示的热潮。其中重要的出版物有:由东京大学近代中国史研究会编译的《毛泽东思想万岁》(东京三一书房,1974年—1975年),新岛淳良编辑的《毛泽东最高指示》(东京三一书房,1970年),竹内实编译的《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的语录》(东京现代评论社,1974年),矢吹晋编辑的《毛泽东谈社会主义建设》,田太胜洪编译的《毛泽东谈外交路线》,滕本幸三编译的《毛泽东谈人间革命》(以上三本均为东京现代评论社1975年出版)。

此外,还翻译出版了不少国外研究毛泽东及其思想的著作。

日本在资料方面的雄厚,使这一时期参与资料搜集整理、翻译的日本学者推出了大量的研究成果。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日本出版的研究毛泽东及其思想的著作近百部,还发表了大量的论文。这些论著研究的范围比较广泛,在政治、经济、哲学、军事、文学、毛泽东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等方面都有涉猎,而其中关于毛泽东的哲学思想和毛泽东军事战略理论的研究,有一定深度,其成果也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关于毛泽东的哲学思想,探讨比较多的是其来源。日本有不少学者都肯定毛泽东哲学同中国传统哲学之间联系,有的还特别从中国传统哲学的内容上考察了毛泽东哲学来源。大滨浩的《中国的思维传统》、加地伸行的《中国人的逻辑学——从诸子百家到毛泽东》,都分别具体分析和探讨了毛泽东辩证法与中国传统辩证法的关系。他们从老子、孙子、董仲舒及方以智、张横渠等中国古代哲学家的思想来考察《矛盾论》在世界观方面与传统哲学的关系;从韩非子的《五蠹篇》、董仲舒的《春秋繁露》、何休的《春秋公羊解诂》、康有为的《春秋笔削大义微言考》、《礼运注》等来说明《矛盾论》在历史方面与传统哲学的关系。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学者注意到了毛泽东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关系的不同类型。比如,竹内实、野村浩一等人认为,中国的阴阳二元论是毛泽东辩证法思想的来源。这种来源的表现与性质并非像马克思继承黑格

尔的那一种关系,而两者在本质上是一种关系。而新岛淳良则认为,“毛泽东的辩证法思想在本质上与阴阳二元论有着差别”:“阴阳二元论的二项对立虽然是互以对方为存在的前提,但对立二项是各由对立的他项来充实自己的,而不是互相侵犯、互相消灭的”。^[2]而毛泽东“决不会仅强调外在的影响,也不会把对立的双方作为固定了的位来把握,而是作为斗争来把握,看成是吃与被吃的斗争,是一方克服一方,一方侵占一方的世界。”也正是这一本质上的区别,使得毛泽东“扩展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运用范围,丰富了唯物辩证法。”所以,中国传统的阴阳二元论是毛泽东辩证法的“反面教员”。在毛泽东哲学同西方哲学和自然科学的关系方面,日本不少学者认为毛泽东哲学不但受到西方哲学的影响,而且受到西方自然科学的影响。新岛淳良在其著作《毛泽东的哲学》中指出:“列宁的《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表达了物质的多层次思想,坂田的论文具体地阐明了这一思想如何对现代量子力学发展起了引导作用。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所表现出来的兴趣,正如同恩格斯和列宁对当时物理学最高成就所具有的兴趣一样。”在毛泽东哲学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系方面,尾崎庄太郎、竹内实等认为毛泽东的主要哲学著作《矛盾论》和《实践论》,“与其说他们是建立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经典研究之上而成的著作,莫不如把它说成是基本上通过从日本翻译的这些苏联教科书的著作的学习而成的。”他们认为,毛泽东的“两论”是从20世纪20年代末到30年代前早期的苏联哲学的所谓“列宁阶段”里产生的,是以米丁等人为中心编写的教程、辞典等著作为基础的,而且不少部分几乎是完全借用的。这种观点虽不符合历史事实,但指出了“两论”与苏联30年代教科书的联系,这对正确评价“两论”是有益的。

此外,对毛泽东认识论的研究,关于自觉的能动性,日本学者认为,自觉能动性的理论是显示毛泽东的认识辩证法特色的最重要理论之一。竹内实在《关于自觉能动性问题》的文章中具体考察了毛泽东这一思想的构成和发展。他认为,毛泽东的自觉能动性思想萌芽于1917年4月《体育之研究》一文。并把此文称作是毛泽东走向马克思主义的突破口。随着毛泽东认识论进一步成熟,在《论持久战》和《改造我们的学习》两篇文章中,自觉的、能动性的辩证过程思想得到了详实的阐发。他得出结论,自觉能动性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的核心之一。关于认识的发展阶段,日本学者对“感性阶段”与“理性阶段”的划分有过争论。武谷三男把对自然界科学认识分为现象阶段、实体阶段和本质阶段。梅本克认为,武谷所说的后两个阶段就是毛泽东所说的“理性认识阶段”。而新岛淳良则认为,两者有质的差别。武谷的作为对象的自然界自身三阶段中的“阶段”,同认识的“阶

段”是有区别的。武谷的“阶段”是毛泽东所说的“运动的形式”。武谷的三阶段论既作为自然界客观结构,又同时作为人的认识结构,这在理论上是不科学的。武谷的三阶段是人类全部认识史上的特定阶段、特定认识领域的发展规律,而不是一般认识的运动规律。毛泽东继承和发展了列宁的观点,把人的认识内容发展概括为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过程。

对毛泽东的认识论,日本学术界也有学者认为是有缺陷的。三浦勉认为,毛泽东的认识论在处理人与社会有关的具体事件和问题时,是极为有效和实际的;但在涉及到抽象的形而上学问题时,就显得困难重重,显示出了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区别。

关于毛泽东的军事战略理论:(一)毛泽东军事战略理论的来源。概括日本学者这方面的各种论述,其基本的观点认为,毛泽东军事战略理论的渊源有两个:一是吸收了西方军事理论的精华;二是继承了中国古代杰出的战略战术思想。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他独具特色的军事学说。如持田真一在《关于毛泽东的军事战略的一点研究》中认为:“毛泽东的战略思想,是以马克思列宁的教义——辩证法的分析和唯物论的思考为基础的。他学习了列宁的战略,既吸取了克劳塞维茨^[3]的《战争论》的理论,也受到了他在少年时期爱读的中国传奇小说(如《岳飞传》、《水浒传》、《隋唐演义》、《三国演义》和《西游记》等)的影响,同时还斟酌了他非常感兴趣的《太平天国之乱》、《孙子·吴子》、《六韬·三略》等东方古兵法思想和教义,通过以中国的广阔国土为舞台而展开的‘国内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不断地实际验证,逐渐地形成了他的军事战略体系。这就是‘革命战争’的战略理论。”还如伊藤皓文在《毛泽东战争论》中,通过对毛泽东战争论和西方军事理论之一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的比较,认为“从共同之处很多这一点,重新发现了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的伟大。从探讨不同点中,我看到了毛泽东革命战争论的新发展和独创性。”(二)对战略战术的研究。战略战术问题,是毛泽东军事战略理论的核心内容,日本学者尤为重视研究毛泽东的战略战术理论,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对毛泽东战略战术理论提出了新的理解和看法。伊藤皓文在《毛泽东战争论》中,认为毛泽东的战略理论是从“敌人的强大”、“红军的弱小”这样一种敌我力量关系的特点出发而提出的。由此他认为,毛泽东的战略是“弱者的战略”,是“弱者转化为强者的战略”。河野收在《论毛泽东战略思想的形成》、《探索毛泽东战略思想的来源》等文章中,认为:“毛泽东思想,是现代中国革命的产物。他的战略,对他最后成为胜利者起了重大作用。”关于毛泽东战略理论的形成发展问题,他指出:“毛泽东早期的战略思想已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

中基本完成。不过……这篇论文所反映出来的,还有远比毛泽东早期战略思想更重要的东西,即就是毛泽东战略思想的出发点和本质。”他进一步指出:“毛泽东早年在井冈山和瑞金时期形成并得到运用的那些军事原则,至今依然是中国战略思想的基础。”久住忠男在《富有生命力的毛泽东战略思想》一文中,就为什么毛泽东的战略理论富有价值的问题进行了探讨,文章认为:“人们重视毛泽东战略理论的价值,不仅仅因为他所领导的革命战争取得了胜利,还由于他的论述有着坚实的理论基础,而且自成体系。这一方面是由于他能运用哲学观点研究问题;另一方面应该归功于他长期参加革命战争的实践”。持田真一在《关于毛泽东的军事战略的一点研究》中,认为毛泽东军事战略理论包含五大战略,既统一战线战略、根据地战略、持久战战略、游击战战略和核战略。而这些战略有四大特色,即“军事战略从属于政治策略”、“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的原则”、诱敌深入的思想——“内陆歼敌的思想”、“彻底的歼灭战思想”。实户宽在《毛泽东的军事思想》中指出:“毛泽东作为军事领导人的真正伟大之处,不仅在于他‘善于作战’,而且还在于他创立了‘人民军队’和拟订出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他一边引用毛泽东的论述,一边议评,分别从游击战、持久战、歼灭战、主动性四个方面阐述了毛泽东的战术理论。(三)对建立人民军队理论的研究。实户宽在研究毛泽东人民军队和人民战争理论方面论著颇丰。他在《毛泽东的军事思想和建军路线》和《毛泽东的军事思想》等文章中,集中研究论述了毛泽东的这一理论。关于建立人民军队的基本内容,他指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三种武装力量体制、三大民主、三大任务、三大关系(官兵一致、军民一致、瓦解敌军),这些是建设人民军队的基本内容。”关于建立一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军队的理论,实户宽认为,毛泽东的伟大贡献在于改造了农民、失业者及游民,把他们组织成了一支思想统一、纪律严明、富有战斗力的人民军队。(四)对毛泽东军事战略理论重要地位的研究。日本学者在研究毛泽东军事战略理论内容的同时,还高度评价了毛泽东的军事战略理论。实户宽在《毛泽东的军事思想和建军路线》中指出:“毛泽东是一位伟大的革命家。他是一位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到一个新阶段的伟大的理论家。但是,我认为,与马克思、列宁所不同的是,他同时又是一位伟大的军事领袖和军事理论家。”他在《中国红军史》一书中还写道:“当我写完这部红军十年史的时候,强烈地感到大军师毛泽东的存在。”“毛泽东是提出人民战争和人民军队这一完全新型的战争理论的伟大的军事领导人。”日本著名军事评论家林克也指出:毛泽东“创造性地、科学地、划时代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的军事理论,建立了与资产阶级军事学说根本不同的无产阶级军事学说和军事原

则。”久住忠男在《战争、战略、日本》中指出：毛泽东“就游击战的内容所作的论述，比任何一本战略书都更为丰富。他对战争的各个阶段所进行的战略分析十分精辟，无论是在政治上还是军事上，都恰如其分和极为重要，而且他那富有想象力的论述是举世罕见的。这也就是为什么在二十世纪产生的最优秀的战略理论中，首推毛泽东的游击理论的原因。”

总之，自 20 世纪 60 年代至 70 年代末，日本学者在研究毛泽东及其思想方面发展是比较快的。

80 年代以后，由于此前毛泽东去世后国际上刮起的一股“非毛”歪风，日本研究毛泽东思想的兴趣一度下降。但随着中共《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发表，对毛泽东及其思想的历史地位科学地实事求是地评价，并陆续出版了毛泽东的各类著作，公布了一批档案资料，日本研究毛泽东及其思想的新著、文章又逐渐增多起来。这一时期日本研究毛泽东的焦点，主要集中在如何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怎样认识毛泽东思想的遗产及邓小平对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问题上。在这些方面，日本学者作了不少探讨。关于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遗产，就总体而言，日本学者普遍给予了比较客观的评价。如日本著名历史学家井上清在 1988 年 2 月指出：“不管怎么说，重要的是毛泽东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运用到中国革命中，他利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具体地分析了中国的具体现实，找到了中国革命的道路，最后制定出农村包围城市这一马克思和列宁都未曾考虑到的，当时被共产国际视为异端的伟大战略，而且在革命实践中取得了胜利。我们就是要学习这种思想和方法。”井上清接着指出：“毛泽东的《矛盾论》和《实践论》等哲学著作的理论价值，今天依然非常有效和有益。我是研究日本历史的，从史学研究的角度看，我认为《矛盾论》是不可缺少的理论性指针，很好地运用《矛盾论》，对历史研究十分重要。”还如野村浩一在其著作《人类智慧的遗产——毛泽东》^[4]中指出：“毛泽东逝世后，中国又迈开了新的步伐。而这个国家的指导思想，不是别的，仍然是‘毛泽东思想’本身。毛泽东思想作为一种思想体系已成为引导这个国家走向 21 世纪的指导思想。”他在书的结尾部分写道：“毛泽东的思想在人类智慧的遗产中已成为重要的组成部分。这是确定无疑的。”

关于邓小平对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日本学者大泽升把毛泽东与邓小平进行了一番比较，他说：“如果把 50 年代、60 年代称作毛泽东时代的话，那么 80 年代就是邓小平时代”。他认为，毛泽东与邓小平两人的相同点，“那就是两个人都强调建设‘中国式社会主义’，即‘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毛泽东与邓小

一期上发表《中国农民中各阶级的分析及其对革命的态度》，阐述了同样的观点。1926年2月，国民党中央设农民运动委员会，毛泽东任委员。此后，他便以更多的力量从事农民运动。1926年9月，他在《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中强调，“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所谓国民革命运动，其大部分即是农民运动。”^[7]

1927年3月，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再次热情赞扬了农民的革命行动，强调“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农村革命是农民阶级推翻封建地主阶级的权力的革命。农民若不用极大的力量，决不能推翻几千年来根深蒂固的地主权力。农村中须有一个大的革命热潮，才能鼓动成千上万的群众，形成一个大的力量。”^[8]毛泽东指出贫苦农民革命性最强，是打倒封建势力的先锋，成就革命大业的元勋，“没有贫农，便没有革命，若否认他们，便是否认革命。若打击他们，便是打击革命。”^[9]越是贫困的农民，越富有革命性。正是基于对贫苦农民中所蕴藏的革命性的认识，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才能为开创出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做出突出贡献，也才有抗日战争时期的农民革命论。

毛泽东的农民革命论也是对传统农民革命的继承和发展。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用于中国历史的分析，指出了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史就是阶级斗争的历史。他热情讴歌古代的农民造反，认为农民战争是历史前进的重要推动力量。

1938年，毛泽东在延安各界庆祝斯大林60寿辰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蒂，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几千年来总是说压迫有理，剥削有理，造反无理。自从马克思主义出来，就把这个旧案翻过来了，这是一个大功劳。”

“造反有理”是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阶级观点所作的最通俗的表达。运用这个观点，毛泽东分析了中国古代的农民起义。他说：“地主阶级对农民的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迫使农民多次地举行起义，以反抗地主阶级的统治。从秦朝的陈胜、吴广、项羽、刘邦起，中经汉朝的新市、平林、赤眉、铜马和黄巾，隋朝的李密、窦建德，唐朝的王仙芝、黄巢，宋朝的宋江、方腊，元朝的朱元璋，明朝的李自成，直到清朝的太平天国，总计以大小数百次的起义，都是农民的反抗运动，都是农民的革命战争。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规模之大，是世界历史上所仅见的。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因为每一次较大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结果，都打击了当时的封建统治，因而也就多少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10]

重任务是反帝反封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发生和发展的。

其次,阶级阵营不同。旧式农民革命是单纯的农民战争,只有农民阶级一个阶级与封建统治者战斗。因为当时还没有别的阶级,只有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两大阶级的对抗。而到了民主革命时期,参加反帝反封建的阶级除了农民阶级外,还有无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毛泽东把中国从古到今的革命分为古代农民革命、近代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现代革命。这几个革命的不同就在于阶级阵营不同,领导者也不同。近代资产阶级革命由资产阶级领导,现代新民主主义革命由无产阶级领导。有了新的阶级和政党,就使革命有了新的内容和特色。新民主主义革命新就新在无阶级及其政党的领导上。梁启超在《中国历史上革命的研究》中,把中国传统“革命”与近代西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行比较,指出中国传统“革命”是“有私人革命而无团体革命。”毛泽东则从传统“革命”中吸取借鉴,强调了无产阶级对民主革命的领导权,并把党的领导和党自身的建设作为中国革命的三大法宝之一。他在对传统农民革命继承的同时又作了严格的限定。毛泽东说: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绝不是枪指挥党。毛泽东指出农民虽然是革命的主力军,“然而他们小生产的特点,使他们的政治眼光受到限制(一部分失业群众则具有无政府思想),所以他们不能成为战争的正确领导者。因此,在无产阶级已经走上政治舞台的时代,中国革命战争的责任,就不得不落到中国共产党的肩上。在这种时候,任何的革命战争如果没有或违背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那个战争是一定要失败的。因为半殖民地的中国的社会各阶层和各种政治集团中,只有无产阶级和共产党,才最没有狭隘性和自私自利性,最有远大的政治眼光和最有组织性,而且也最能虚心地接受世界上先进的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经验而用之于自己的事业。因此,只有无产阶级和共产党能够领导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克服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狭隘性,克服失业者群的破坏性,并且还能够克服资产阶级的动摇和不彻底性(如果共产党的政策不犯错误的话),而使革命和战争走上胜利的道路。”^[13]

同时,毛泽东还对中国共产党长期处于农村游击战争环境,党员的主要成分是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的情况,提出了用无产阶级思想去改造农民意识,克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建党的方法。毛泽东认为决定党的性质的不仅仅是党员的成分,根本上还是党的指导思想和党的纲领。只要用无产阶级思想去教育农民、武装农民,把他们提高到无产阶级先进分子的水平,使他们在无产阶级政党这个大熔炉中锻造成为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战士,就能保持党的无产阶级性质。

再次,新旧农民战争的理论武器不同。旧式农民战争的理论武器主要是平

论红军长征在甘、宁期间对回族施行的政策

张文琳

甘肃、宁夏是两个重要的回族聚居区,20世纪30年代时回民占两地总人口的“二分之一至四分之三”^[1]。1935年7月至1936年10月,红二十五军,红一、二、四方面军先后长征经过甘、宁;1936年6月,红军西方野战军西征再度进入甘、宁。期间,红军宣传与贯彻执行了党的民族政策。对此,学术界尚无专文讨论。值此纪念红军长征胜利60周年之际,本文试图拾遗补阙,就其主要内容和历史作用加以探讨。不妥之处,敬请专家同行不吝指教。

一

在探讨上述问题之前,有必要阐明红军长征在甘、宁期间的回族问题。

马列主义认为,私有制关系“是造成一些民族剥削另一些民族的原因”^[2],“现代帝国主义正在加紧征服弱小民族,它是加深民族压迫的新因素”^[3],这就是旧中国民族问题的症结所在。

由于历代特别是清代反动统治阶级推行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政策,甘肃、宁夏一带本来就回汉民族严重对立,民族关系十分紧张,常发生民族纠纷,致酿祸变,史有“回汉世仇”之载。红军长征到达西北前夕,蒋介石国民党政权,一方面利用高官厚禄收买、扶植阿訇等回族上层人物,帮助政府统治、剥削劳动人民;另一方面又制造回汉各族间新的壁垒。他们严格禁止回族人民与汉族人民及其他各族人民间经济文化交往,同时还对回族人民进行欺骗宣传,说什么共产党“共产共妻”、“杀回灭教”、“共产党来了要回民吃猪肉”,要回民群众“舍命保教”及“舍西德”(伊斯兰教对圣战中阵亡的穆斯林的称谓。《古兰经》称此种人可以直接进天国,在“安拉”前有特殊地位)。^[4]尤其毒辣的是,他们加紧推行民族同化政策,只承认有回教而不承认回族是一个民族。他们所谓的“汉、满、蒙、回、藏”中的“回”指的是新疆维吾尔族。他们把回族问题简单地称之为“边政问题”之一。

他们不断地制造回族与汉族及其他各族间的纠纷,甚至仇杀。1928年河洲(今临夏)事变中,国民军将领赵席聘挑动汉族民团火烧西北“五马”的老家、号称“小北京”的八坊,使4万多回民群众流离失所,汉回间仇杀不已。

自大革命失败后,甘、宁、青地区的回汉军阀又割据称雄,故态复萌。他们互相勾结利用,时而倾轧混战,兵灾、匪祸、内战使回汉各族人民蒙受巨大灾难。从1928年5月至1935年先后发生了:国民军突袭凉州(今武威)镇守使马廷勳,马仲英流窜劫掠与国民军追击防堵,中原大战爆发后蒋介石唆使陈珪璋、马廷贤等反冯势力扰乱国民军后方,原国民军雷中田部在兰州进攻马鸿宾部而陕军杨渠统、段象武部又西进出击雷部,马鸿逵、马鸿宾、马步芳、马步青在宁夏拒流氓军阀孙殿英等混战。战火所及,生灵涂炭,庐舍田园,半为废墟。如上述“四马”拒孙之战中,无辜百姓死伤者达三四千人。战后,据当时记载:“夏、朔、平、磴四县,被灾七万五千余户,灾民四十五万八千余人,炮火打伤的及冻饿而死者,五千三百八十四人。此外,牲畜、农具、米粮、财物、房屋等项的损失,总计达两千多万元;无籽种、耕畜,耽误农业生产的土地,计有九十七万余亩。”^[5]而土匪、恶霸则乘军阀混战之机为非作歹。1929年初,洮西土匪张彦明乘临潭回民新老教之争带队打败藏兵胁迫回民起事,国民军赶到后镇压,将躲避在老城清真寺的回民群众与大寺一起付之一炬,藏兵又追杀和屠杀逃亡回民及太平寨回民四千多人,另将欺骗来的回归者在旧城西门外掘“万人坑”十余个,将10岁以上的回民男子,每10人捆在一起,全部坑杀。就在此期间的1929年,甘、宁地区已连续三年不雨,造成大旱灾。到1930年,甘肃78个县,受灾者60个县,灾民达311万人,死亡人数达7万人。该地区全户、全族、全村死绝者,比比皆是,惨不忍睹,可谓人间罕见之浩劫。

伴随上述野蛮统治的是,在经济上对回汉各族人民残酷地剥削和掠夺。蒋介石政权使尽盘剥勒索之能事,收不尽的杂税,派不完的粮款。1934年,宁夏省政府《宁夏公报》中开列的捐税项目达31种。另外还有二十多种名目繁多的捐、税、费。1936年宁夏受灾,豫旺地区更是严重,但军阀政府的“国赋”照旧,广大农民只能借债度日。在《西行漫记》中有一段记载西征军政治部主任刘晓写的《豫旺调查》中的一段话:在豫旺,“百分之七十的农民欠债,百分之六十的农民靠借粮糊口……。平均欠债三十五元和三百六十磅粮食,比他们的土地价值高得多。”^[6]在甘肃,当时每到年关季节,各种提款委员四处催逼,络绎不绝。这些人的吃、住、炭火、鸦片、纸烟乃至生发油、雪花膏均需县上负担,县方又摊之于民,因而回汉各族老百姓愤怒地说:“催款员,真有权,一年能刮五千元。娶姨太,置